

第三十八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降下帷幕
我国选手一共夺得六项冠军
男女团体,男单江加良,女单曹燕华,混双蔡振华和曹燕华,
女双戴丽丽和耿丽娟.男双由瑞典选手获得

本报哥德堡7日电 记者陈兴贵、刘增民报道:历时十一天的第三十八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4月7日下午在这里的新娘的纳维亚体育馆降下了帷幕。中国乒乓球队继4月2日夺得男女团体冠军后,今天又一举夺得男、女单打,女子双打和混合双打的冠军。这样,我国乒乓球健儿在本届世界赛七个项目的比赛中,夺得六项冠军。

在今天上午举行的混双比赛中,中国的蔡振华和曹燕华同捷克斯洛伐克的潘斯基和赫拉雷娃相遇,在9比21先负一局的情况下,奋起拼搏,以21比12,21比8连胜两局,夺得冠军。

男、女单打和女子双打决赛,都是在中国选手之间进行,江加良获得男单冠军,曹燕华获得女单冠军,戴丽丽和耿丽娟获得女双冠军。男双决赛在瑞典的阿佩尔伦、卡尔松和捷克斯洛伐克选手奥洛夫斯基、潘斯基之间进行,瑞典选手夺得男双冠军。

据新华社北京4月7日电 中国乒乓球协会名誉主席杨尚昆,国家体委、中华全国体育总会致电报给中国乒乓球代表团,对中国乒乓球健儿取得的成绩表示祝贺。

新华社北京4月7日电 (记者志红)六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受到全国人民的关注注目,到今天大会秘书处已收到全国各地群众的来信来电一万多件。

据大会秘书处信访组负责同志介绍,六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开幕以来,群众的大量来信、来电从祖国各地和国外一些地区飞向北京,最多时每天有一千多件。许多人在来信、来电中热烈祝贺本次会议的召开,认为这次会议是继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后,加快我国以城市为重点的体制改革改革进程、巩固发展大好形势的又一次重要会议。

各地群众来信、来电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富有建设性。据信访组工作人员的初步整理、分类,来信、来电中对我国各方面工作提出建议、意见的比例比往年有明显增加。不少群众对充分发挥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作用,加强立法工作提出了希望。北京体育学院马润林在来信中建议,成立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任命并对之负责的委员会,负责对各项法律的实施进行监督,其职责是使全国人大对涉及面较大的任何违法及执法不力现象作出迅速反应。江西省钢铁厂退休老工人马继先来信说,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最近社会上的新的不正之风应积极采取措施加以纠正。群众在许多来信来电中要求尽快制定有关法律,以加强对物价、国家工作人员、出版发行工作以及各种经济活动的管理,这表现出法制观念日益深入人心。

经济改革和经济建设是广大群众极为关切的大事,不少人在信中对这提出了建议。哈尔滨市东安机械厂王剑华来信说,扩大企业自主权后,社会资金的使用会分散开来,如不加控制和指导,重复建设、盲目建设的现象会更加严重,从而导致基本建设规模膨胀,造成比例失调。他认为目前很有必要设立国家信息中心,以保证在宏观上对建设进行有效控制,同时有利于企业放权,搞活经济。

大量关于物价和工资问题的来信,表明人民群众对这两项关系到切身利益的问题非常重视。北京市宣武区李树民在来信中说,物价体系的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是改革成败的关键。他对某些企业或商店为自身的小利益而随意提高商品价格表示强烈不满。

还有一些来信来电揭发了某些干部的违法乱纪行为,还有的对落实政策的遗留问题提出了意见。

大会秘书处对群众的来信来电将尽快作出处理。

人民代表大会反映人民意志
全国人民关心人民代表大会

六届人大三次会议收到各地来信来电一万多件,对各方面工作提出富有建设性的意见

春回北京大地 义务植树日好
首都百余万人参加栽树种花劳动
党政军领导干部同群众一道干 部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也参加
五十对新婚夫妇结伴栽幸福树 一百多名少先队员种了火炬树

新华社北京4月7日电 今天是北京市的义务植树日,全市有一百多万人放弃星期日休息,在街道两旁、机关庭院和郊区荒山参加栽树种花劳动。

4月的北京,大地回春,生机盎然。北京市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根据北京的这一气候特点,接受了胡耀邦同志的建议,不久前决定把每年4月的第一个星期日定为北京市的义务植树日。今天,首都城乡到处是植树种花的人群。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阿沛·阿旺晋美、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国务院副总理李鹏、纪纪云、国务委员陈慕华、张劲夫,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王首道、肖克,最高人民

检察院检察长杨易辰以及中共北京市委书记李锡铭、北京市市长陈希同等等,同首都军民一道参加了植树活动。

班禅副委员长于上午九点来到宣武园艺。他手扶铁锹,一边栽树,一边对旁边的群众说:“要大力开展植树活动,努力创造一个好的生态环境。今天我栽三棵树,一是要完成我自己今年的义务植树任务,二是‘三’这个数字藏族的习惯有吉祥之意。”

在西山参加植树的李鹏、纪纪云副总理、张劲夫国务委员,干得十分起劲。李鹏对植树的质量要求严格。他见一位年轻同志没有检查树坑的深度和宽度就准备往坑里放树苗时,赶忙制止,随即弯着腰力挖深坑加宽,直到树坑合格才把树苗

放进去。田纪云副总理干得满头大汗,脱下外衣抛到了一边。他边为树苗培土边对一起劳动的同志说,前人栽树就是为了后人乘凉,就是为了造福子孙后代。张劲夫每栽下一棵树都要认真把土踩实,他强调栽树一定要保证成活率。

在十三陵水库东面山坡上参加植树的肖克说,我们不仅要抓紧植树,绿化荒山,为子孙后代造福。王首道说,栽树不能搞形式,要力争栽一棵,活一棵。

正在北京参加六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和全国政协六届三次会议的部分代表和委员也参加了今天的义务植树劳动。内蒙古的阿拉泰代表植树后高兴地说:“我会有机会在北京参加义务植树劳动,感到非常荣幸。北京是全国各族人民的首都,绿化美化首都也是我们应尽的义务。”来自井冈山、遵义和延安的全国人大代表,为能代表革命老根据地人民在首都种下一棵棵常青树而感到十分高兴。人大代表苗宽植树时还建议北京多种些果树,既绿化了城市,到秋天又可见到果实累累一派丰收景象。

今天的义务植树日活动丰富多彩。北京的五十对新婚夫妇结伴来到潮白河共青团林场,共同栽下了幸福林;一百多名少先队员在这里栽植了红领巾树。在潮白河共青团林场,陈希同市长同一百多名少先队员在一起栽了火炬树。

一棵棵常青树而感到十分高兴。人大代表苗宽植树时还建议北京多种些果树,既绿化了城市,到秋天又可见到果实累累一派丰收景象。

今天的义务植树日活动丰富多彩。北京的五十对新婚夫妇结伴来到潮白河共青团林场,共同栽下了幸福林;一百多名少先队员在这里栽植了红领巾树。在潮白河共青团林场,陈希同市长同一百多名少先队员在一起栽了火炬树。



改革管理体制组建专业分厂
石家庄拖拉机配件厂端走企业内部的大锅饭

本报讯 河北人民广播电台记者魏永生、本报记者王庚南报道:石家庄拖拉机配件厂在经济体制改革中,把企业“化大为小”,按产品划分专业分厂,厂部对分厂实行“分级决策,两级经营,单独核算,自负盈亏,以利计酬”的管理办法,使基层单位有更多的自主权,出现了干部主动多做工作,工人抢干脏活累活的新气象。去年,全厂产值达二千八百九十五万元,比上年增长10.67%,实现利润二百九十七万元,比上年增长89.62%。

石家庄拖拉机配件厂是全国生产内燃机配件规模最大的、品种最多的专业厂,有各种设备一千四百多套,职工三千七百多人。长期以来,这个厂的产品、产品都是由国家包揽,企业只管按计划组织生产。在企业内部,人财物、产供销统统集中在厂部,生产车间之间、车间与科室之间经常脱节、扯皮,企业内部吃“大锅饭”,致使厂里的人员、设备潜力得不到发挥,企业缺乏活力。

去年7月,这个厂大胆放权,在不增加非生产人员和重复机构的前提下,将过去按工艺设置的九个车间,合并为按产品分类的六个专业分厂。厂部与分厂有统有分,厂部只管重大的全局性决策和决策性的经营,分厂在保证总任务的前提下,有人员调配、单独核算、分配自主、部分技术管理、开展多种经营和制订奖惩办法等权利。分厂侧重“小而专”,挖掘内部潜力,增强企业活力,提高经济效益。

石拖配件厂实行新型管理体制后,厂部领导从过去的繁杂事务中解脱出来了,有时间、有精力去抓企业长期发展目标和技术进步、新产品开发等重大问题。同时也减少了中间环节的扯皮现象。过去气门生产由两个车间往复完成,中间环节多,信息反馈慢,问题不能及时解决。成立气门分厂后,平均每月创利润提高近一倍。

李先念会见乔瓦尼·斯帕多利尼时说
我们希望看到西欧强大

新华社北京4月7日电 李先念主席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意大利国防部长乔瓦尼·斯帕多利尼。

乔瓦尼·斯帕多利尼转交了意大利总统桑德罗·佩尔蒂尼给李先念主席的信。李先念主席祝愿八十九岁的桑德罗·佩尔蒂尼总统健康长寿。接着,双方就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交换了意见。

李先念对西班牙、葡萄牙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感到高兴。他说,我们希望看到西欧强大。

李先念谈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血的教训。他说,全世界人民需要和平,不要打第三次世界大战。中国不希望打仗,欧洲也不希望打仗。

乔瓦尼·斯帕多利尼说,意大利与中国社会制度不同,但意大利同中国一样也在为世界和平而努力。我们正在加强西欧的力量,加强欧洲团结。

不久以前,在浙江省仙居县郑桥乡一个名叫中央寨的偏僻小山村里,出现一件哥哥偷树、弟弟报案、父亲秉公执法的新鲜事。

2月1日傍晚,这个只有三十来户幽静的小山村,人们正端起饭碗吃饭,忽然传来村民委员会主任沈德林的喊声:“乡亲们,吃了夜饭,到我家来评理啊!”村民们都感到奇怪,有的说:“村规约昨天才订,今天就有人违犯了,这下有好看的了!”

饭后,沈德林家挤满了人。大家低声地议论着。沈德林严肃地说:“我的儿子沈金荣,今天偷砍了一株杉树,违犯了村规约,请大家讨论处理,不留留情。”可屋子里一片寂静。老沈看大家没有开口,

父与子

沈金荣是初次做错事,这样罚太重了。”也有人说,“树已经送回来了,叫他检讨一下算了,钱就勿要罚了!”沈德林听了却不退让,他说:“就这样办,钱要罚,检讨也要罚!”沈金荣当场作了检讨,并交上六十元的罚金。

这件事来得突然,处理得真快,那么,是谁向村主任报案的呢?原来,不是别人,就是沈金荣的弟弟沈增民。村里的人知道这件事的原委后,都说:法制宣传真管用,就象一股春风,吹到了人们的心坎上。

浙江省仙居县
黄冬初 梁福宝 胡瑞雄

就心直口快地说:“大家不肯说,我心中有数,我看按村规约罚,让金荣当面向大家检讨,同时罚款六十元。”话刚说完,就象在滚烫的油锅里撒下一把盐。有的说,“金荣是初次做错事,这样罚太重了。”也有人说,“树已经送回来了,叫他检讨一下算了,钱就勿要罚了!”沈德林听了却不退让,他说:“就这样办,钱要罚,检讨也要罚!”沈金荣当场作了检讨,并交上六十元的罚金。

这件事来得突然,处理得真快,那么,是谁向村主任报案的呢?原来,不是别人,就是沈金荣的弟弟沈增民。村里的人知道这件事的原委后,都说:法制宣传真管用,就象一股春风,吹到了人们的心坎上。

浙江省仙居县
黄冬初 梁福宝 胡瑞雄

胡耀邦会见南共联盟考察团
对中南两党关系健康地向前发展表示满意

新华社北京4月7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今天晚上在会见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考察团时说,他对中南两党关系健康地向前发展表示满意。

这个四人考察团是由南共联盟中央委员、塞浦路斯和希腊的领导人组成的。考察团在贝尔格莱德期间,曾同南斯拉夫领导人进行了广泛、深入的交谈,就两国关系正常化、发展友好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交换了意见。

会见以后,胡耀邦设宴招待南斯拉夫同志。

中联部部长钱仁南、南斯拉夫驻中国大使奥布拉多维奇参加了会见和宴会。

胡耀邦会见南共联盟考察团,新华社记者 王新庆摄

胡耀邦会见南共联盟考察团,新华社记者 王新庆摄

胡耀邦会见南共联盟考察团,新华社记者 王新庆摄

胡耀邦会见南共联盟考察团,新华社记者 王新庆摄

胡耀邦会见南共联盟考察团,新华社记者 王新庆摄

胡耀邦会见南共联盟考察团,新华社记者 王新庆摄

胡耀邦会见南共联盟考察团,新华社记者 王新庆摄

胡耀邦会见南共联盟考察团,新华社记者 王新庆摄

胡耀邦会见南共联盟考察团,新华社记者 王新庆摄

胡耀邦会见南共联盟考察团,新华社记者 王新庆摄

创造美的过程并不全是美

苏扩善

有篇文章谈到,音乐家施光南为了创作出优美的曲子,反地他在钢琴上试效果,外人听来毫无规律,毫无美感,以至引起妻子不快,邻居“抗议”。

由此,我联想到改革。

改革是一件伟大的创造,将给全国人民带来更美好的生活,实实在在一桩美的事业。但是,同优美的乐曲问世一样,它的创造过程并不见得全都是美,改革的一切措施并不都立即得到人们的理解和拥戴。事实上,虽然越来越多的逐渐认识到了改革的紧迫性和必要性,但仍难免有人会因为改革而改变一些老习惯,一时看不到改革“实效”,甚至影响到自己某些眼前利益,而产生埋怨之情,发出非议之声。再者,改革会有失误,甚至要经过一定时间的“阵痛”。对改革过程中的艰难有个客观的估计,才能不动摇,有信心。只要我们认准改革的方向,按照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的《决定》精神去改旧制,革弊端,改革所创造的美是一定能逐步得到完善的。

有感校长“抓经济”

郭言

新学期伊始,某地区的主管部门布置工作,要求“校长头脑里要有经济细胞”,“抓经济”,以备发奖金、改善待遇等。

学校的校长向以抓教学为主,现在又叫“抓经济”,怎样抓呢?于是,各显神通,有的变校舍为商店、厂房,有的让学生占用学习时间去搞“副业”,有的抽出教学人员去经商,真可谓五花八门,无奇不有。

学校是培养人的地方,为四化输送有用人才是学校的任务。如果校长只顾了抓钱,教学任务必受干扰,教学质量也就可想而知了。

校长要关心职工福利,但这只能是在各个学校现有的或可能的条件下做好工作,切不可一哄而起,更不能胡来。作为主管教育部门,应多考虑如何为学校第一线提供服务,为学校排忧解难,不能乱提口号。

主管部门提的口号一多,下面就难免出问题。

胡耀邦会见南共联盟考察团,新华社记者 王新庆摄

印尼外长穆赫塔尔发表谈话

否认所传的接受越南建议

东盟五国“不接受越南侵略柬埔寨所造成的现状”

新华社北京4月7日电 据外国通讯社雅加达消息:印度尼西亚外交部长穆赫塔尔6日在雅加达发表谈话,否认所传印尼比较接近于接受越南提出的关于柬埔寨问题的建议的说法。穆赫塔尔是针对苏联副外长贾瓦才结束同印尼领导人会谈后在雅加达发表的一次谈话而讲这番话的。

穆赫塔尔说,印尼、新加坡、泰国、菲律宾和文莱并未接受今年1月在胡志明市公布的“印支国家”的建议。因为接受这个建议就等于承认现状。而这是“我们过去从未做过、今后也不会做的事情”。因为“我们不接受越南侵略柬埔寨所造成的现状”。

他还说:“我不知道贾瓦才所说的一些东盟国家比较接近于承认现状的话是什么意思。”“即使他真的否认了的话,那么后果也是会使人们糊涂的。”

胡耀邦会见南共联盟考察团,新华社记者 王新庆摄



##

人大代表用生动可信的事实说明

开放是我国坚定不移的国策

本报讯 记者戴玉庆报道：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引进、学习和消化国际先进的科技和管理，给我国经济注入了生机勃勃的活力。参加六届人大三次会议的代表，用生动、可信的事实证实了赵紫阳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的论断：我国现在出现的大好经济形势，是贯彻对外开放、对内搞活政策的结果。

据代表们提供的材料，截至1984年底，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经济特区实际使用的外资达八亿四千万美元，占全国利用外资总额的五分之一。去年4月起实行对外开放的十四个沿海港口城市，在1984年内签订的直接利用外资的协议金额超过了前五年的总和。厦门永泰电子公司从签约到投产只用了3个月时间，生产的电话机具有国际先进水平。厦门美国、日本、香港的直通电话也已开通。大连市扩建了老飞机场，现在可起降包括“波音707”在内的大型客机，城市多年来的供水紧张状况也已缓解。开放，极大地促进了我国十四个沿海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工程，这不仅将使外国厂商和投资者有一个良好的投资环境，也有助于改善当地居民的生活、工作、学习、文化娱乐的条件。

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也使群众在思想观念、精神面貌方面为之一新。人大代表、温州市人大常委会委员说，对外开放以来，温州人爱说三句话：“五十年代解放放海岛的前线，六十年代革命斗争的火线，八十年代缩短基本建设战线”。实行开放以来，温州人不再有这样的牢骚了。现在，这里人经常询问“机场何时建成，铁路几时铺设，合资项目又添了多少项。”“物质财富是可贵的，人的精神自身变化”。卢声亮的看法概括地反映了沿海中、小开放城市的情况。实行开放政策使人们问题的视野开阔了，工作有了力，办事的节奏加快了，积极性和创造性提高了。

人大代表、中共南通市委书记朱剑从党的领导角度谈起对于开放政策的看法时说，现在社会上某些人仍对于开放存在一些看法，以为对外开放必定会把资本主义腐朽的生活方式带进来，把社会治安和社会风气带坏，把物价抬高。如果说，实行开放政策以后，要加重思想政治工作，是对的，但夸大开放带来的副作用，在新的矛盾面前束手无策，则是不可取的。

李修仁翻开笔记本，讲了几笔统计数字：1984年，山西省原煤总产量达一亿八千五百万吨，比1983年增长15.9%。原煤外运达到一亿二千七百万吨，比上年增长9.5%。1984年，山西省国家统配煤矿总产量为八千多万吨，比上年增加五百万吨；地方煤矿和乡镇煤矿总产量为一亿多万吨，比上年增加二千万吨。

我回顾了—下，1980年山西省原煤总产量不过七千万吨，其中国家统配煤矿产量为五千万吨，地方煤矿和乡镇煤矿产量二千万吨，是五比二。四年以后，国家统配煤矿每年增加产量七百万吨，地方煤矿和乡镇煤矿每年增加产量二千万吨，小矿多了，地方煤矿的产量已接近三倍。李修仁分析说，山西是我国最大的煤炭基地。国家统配的大煤矿要发展，潜力也不小。但发展乡镇煤矿是大优势，数十万农民开井挖煤，利国富民，是山西经济起飞的一条快路。

过去，“重大厂，轻小矿”的观念，阻碍着晋煤的大发展。李修仁说：“现在思想转过来了，原来把乡镇煤矿看成‘辅助’、‘补充’，现在成为发展煤炭生产的重要支柱。”为什么小矿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他说：“一是条件好。山西地下水位低，瓦斯也不多。二是农民开采投资少。国家统配煤矿

的大煤矿要发展，潜力也不小。但发展乡镇煤矿是大优势，数十万农民开井挖煤，利国富民，是山西经济起飞的一条快路。过去，“重大厂，轻小矿”的观念，阻碍着晋煤的大发展。李修仁说：“现在思想转过来了，原来把乡镇煤矿看成‘辅助’、‘补充’，现在成为发展煤炭生产的重要支柱。”为什么小矿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他说：“一是条件好。山西地下水位低，瓦斯也不多。二是农民开采投资少。国家统配煤矿

关于这一点，贵州人大代表中，省经委副主任刘凤鸣的看法有一定代表性。他说，贵州资源分布广，数量大，并且是立体交叉型。山表面，是林木、药材、水果、大理石……地下层，是煤和锦、铝、铜、金、银等矿石；湍急落差大的河流，可利用的发电率达三千三百多千瓦，超过1980年全国水力发电量

世界石油勘探公司的先驱——美国西方物探公司向中国提供名副其实的IBM PC—XT型个人电脑

4月15日以前订货的5月交货 4月16至30日以前订货的6月交货

本公司经营项目包括：

IBM个人电脑系列全套的销售、服务和技术指导

为石油、采矿制造和矿产提供应用软件

IBM PC—XT型汉语拼音词处理

与IBM个人电脑联接数字转换器、标图器和打印机，个人电脑家具和附件

PC-I 从3,894 至 5,067美元

PC-XT 从6,126 至 7,299美元

若买大量的货，我们一般给折扣

本公司系IBM产品特约经营者，欢迎咨询

西方物探公司北京办事处地址：长城饭店307房间 电话：505366 电传：210151 WESCC CN

有法必依 执法必严

——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委员沈鸿

本报记者 于国厚

白发稀疏、精力充沛的沈鸿代表，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委员。我对他的访问，是从他对我的访问开始的：“你说，有多少正式文件，领导讲话，请示报告，引用《宪法》怎么说，某某法律是怎么规定的？”

没等我回答，沈鸿就拿起桌上的《刑法》，指着有关条文说：“这里规定得明明白白，贪污盗窃、行贿受贿、投机倒把要判刑的，为什么有些非法倒卖汽车、彩电并从中国走私的人不依法处罚？”

人民的委托，工作的职责，使沈鸿一直这么认真。

沈鸿代表认为，加强我国法制建设，有两方面工作要做，一是要加立法；二是要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才能到达立法的目的。现在许多地方做得不够好。

仅1979年至198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宪法》、人大和人大常委会通过或批准了一批经济法律，国务院颁布了许多经济法规，这说明我国在经济活动方面，并不都是无法可依

的。问题是有的一些不严格依法办事，有令不行，有禁不止。

“我认为，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主要原因有三”，沈鸿代表说，“一是有领导干部法制观念淡薄，往往以言代法，以权代法，干扰政法部门依法办事。二是有司法部门的两面政治素质比较差，在保护层、关系网面前不能实事求是，铁面无私地依法办案。三是学法

知法懂法的人太少，连一些职务相当高的领导干部也不懂法律。”

沈鸿代表说，现在，有领导干部法制观念淡薄，往往以言代法，以权代法，干扰政法部门依法办事。二是有司法部门的两面政治素质比较差，在保护层、关系网面前不能实事求是，铁面无私地依法办案。三是学法

知法懂法的人太少，连一些职务相当高的领导干部也不懂法律。”

沈鸿代表说，现在，有领导干部法制观念淡薄，往往以言代法，以权代法，干扰政法部门依法办事。二是有司法部门的两面政治素质比较差，在保护层、关系网面前不能实事求是，铁面无私地依法办案。三是学法

知法懂法的人太少，连一些职务相当高的领导干部也不懂法律。”

沈鸿代表说，现在，有领导干部法制观念淡薄，往往以言代法，以权代法，干扰政法部门依法办事。二是有司法部门的两面政治素质比较差，在保护层、关系网面前不能实事求是，铁面无私地依法办案。三是学法

知法懂法的人太少，连一些职务相当高的领导干部也不懂法律。”

沈鸿代表说，现在，有领导干部法制观念淡薄，往往以言代法，以权代法，干扰政法部门依法办事。二是有司法部门的两面政治素质比较差，在保护层、关系网面前不能实事求是，铁面无私地依法办案。三是学法

知法懂法的人太少，连一些职务相当高的领导干部也不懂法律。”

沈鸿代表说，现在，有领导干部法制观念淡薄，往往以言代法，以权代法，干扰政法部门依法办事。二是有司法部门的两面政治素质比较差，在保护层、关系网面前不能实事求是，铁面无私地依法办案。三是学法

知法懂法的人太少，连一些职务相当高的领导干部也不懂法律。”

沈鸿代表说，现在，有领导干部法制观念淡薄，往往以言代法，以权代法，干扰政法部门依法办事。二是有司法部门的两面政治素质比较差，在保护层、关系网面前不能实事求是，铁面无私地依法办案。三是学法

知法懂法的人太少，连一些职务相当高的领导干部也不懂法律。”

沈鸿代表说，现在，有领导干部法制观念淡薄，往往以言代法，以权代法，干扰政法部门依法办事。二是有司法部门的两面政治素质比较差，在保护层、关系网面前不能实事求是，铁面无私地依法办案。三是学法

知法懂法的人太少，连一些职务相当高的领导干部也不懂法律。”

沈鸿代表说，现在，有领导干部法制观念淡薄，往往以言代法，以权代法，干扰政法部门依法办事。二是有司法部门的两面政治素质比较差，在保护层、关系网面前不能实事求是，铁面无私地依法办案。三是学法

沈鸿代表说，现在，有领导干部法制观念淡薄，往往以言代法，以权代法，干扰政法部门依法办事。二是有司法部门的两面政治素质比较差，在保护层、关系网面前不能实事求是，铁面无私地依法办案。三是学法

知法懂法的人太少，连一些职务相当高的领导干部也不懂法律。”

沈鸿代表说，现在，有领导干部法制观念淡薄，往往以言代法，以权代法，干扰政法部门依法办事。二是有司法部门的两面政治素质比较差，在保护层、关系网面前不能实事求是，铁面无私地依法办案。三是学法

知法懂法的人太少，连一些职务相当高的领导干部也不懂法律。”

沈鸿代表说，现在，有领导干部法制观念淡薄，往往以言代法，以权代法，干扰政法部门依法办事。二是有司法部门的两面政治素质比较差，在保护层、关系网面前不能实事求是，铁面无私地依法办案。三是学法

知法懂法的人太少，连一些职务相当高的领导干部也不懂法律。”

沈鸿代表说，现在，有领导干部法制观念淡薄，往往以言代法，以权代法，干扰政法部门依法办事。二是有司法部门的两面政治素质比较差，在保护层、关系网面前不能实事求是，铁面无私地依法办案。三是学法

知法懂法的人太少，连一些职务相当高的领导干部也不懂法律。”

沈鸿代表说，现在，有领导干部法制观念淡薄，往往以言代法，以权代法，干扰政法部门依法办事。二是有司法部门的两面政治素质比较差，在保护层、关系网面前不能实事求是，铁面无私地依法办案。三是学法

知法懂法的人太少，连一些职务相当高的领导干部也不懂法律。”

沈鸿代表说，现在，有领导干部法制观念淡薄，往往以言代法，以权代法，干扰政法部门依法办事。二是有司法部门的两面政治素质比较差，在保护层、关系网面前不能实事求是，铁面无私地依法办案。三是学法

知法懂法的人太少，连一些职务相当高的领导干部也不懂法律。”

沈鸿代表说，现在，有领导干部法制观念淡薄，往往以言代法，以权代法，干扰政法部门依法办事。二是有司法部门的两面政治素质比较差，在保护层、关系网面前不能实事求是，铁面无私地依法办案。三是学法

知法懂法的人太少，连一些职务相当高的领导干部也不懂法律。”

沈鸿代表说，现在，有领导干部法制观念淡薄，往往以言代法，以权代法，干扰政法部门依法办事。二是有司法部门的两面政治素质比较差，在保护层、关系网面前不能实事求是，铁面无私地依法办案。三是学法

知法懂法的人太少，连一些职务相当高的领导干部也不懂法律。”

沈鸿代表说，现在，有领导干部法制观念淡薄，往往以言代法，以权代法，干扰政法部门依法办事。二是有司法部门的两面政治素质比较差，在保护层、关系网面前不能实事求是，铁面无私地依法办案。三是学法

看出，我国的这几项统计数字都是最小的，而且差别相当大。

沈鸿感慨地说：“这种情况与我们四化建设的大目标很不适应，必须在教育体制改革中认真加以解决。”他建议：（一）当前，领导干部应该带头学习法律常识，带头守法，带头执法，以形成人人学法、守法的良好社会风气。（二）在各部委等政府主要部门设法律总顾问，帮助领导同志处理有关法律事宜。（三）选一批有志于学习法律、年龄较轻的大学生脱产补习一两年法律知识，解决法律人才短缺的问题。

沈鸿代表说，现在，有领导干部法制观念淡薄，往往以言代法，以权代法，干扰政法部门依法办事。二是有司法部门的两面政治素质比较差，在保护层、关系网面前不能实事求是，铁面无私地依法办案。三是学法

知法懂法的人太少，连一些职务相当高的领导干部也不懂法律。”

沈鸿代表说，现在，有领导干部法制观念淡薄，往往以言代法，以权代法，干扰政法部门依法办事。二是有司法部门的两面政治素质比较差，在保护层、关系网面前不能实事求是，铁面无私地依法办案。三是学法

知法懂法的人太少，连一些职务相当高的领导干部也不懂法律。”

沈鸿代表说，现在，有领导干部法制观念淡薄，往往以言代法，以权代法，干扰政法部门依法办事。二是有司法部门的两面政治素质比较差，在保护层、关系网面前不能实事求是，铁面无私地依法办案。三是学法

知法懂法的人太少，连一些职务相当高的领导干部也不懂法律。”

沈鸿代表说，现在，有领导干部法制观念淡薄，往往以言代法，以权代法，干扰政法部门依法办事。二是有司法部门的两面政治素质比较差，在保护层、关系网面前不能实事求是，铁面无私地依法办案。三是学法

知法懂法的人太少，连一些职务相当高的领导干部也不懂法律。”

沈鸿代表说，现在，有领导干部法制观念淡薄，往往以言代法，以权代法，干扰政法部门依法办事。二是有司法部门的两面政治素质比较差，在保护层、关系网面前不能实事求是，铁面无私地依法办案。三是学法

知法懂法的人太少，连一些职务相当高的领导干部也不懂法律。”

沈鸿代表说，现在，有领导干部法制观念淡薄，往往以言代法，以权代法，干扰政法部门依法办事。二是有司法部门的两面政治素质比较差，在保护层、关系网面前不能实事求是，铁面无私地依法办案。三是学法

知法懂法的人太少，连一些职务相当高的领导干部也不懂法律。”

沈鸿代表说，现在，有领导干部法制观念淡薄，往往以言代法，以权代法，干扰政法部门依法办事。二是有司法部门的两面政治素质比较差，在保护层、关系网面前不能实事求是，铁面无私地依法办案。三是学法

知法懂法的人太少，连一些职务相当高的领导干部也不懂法律。”

沈鸿代表说，现在，有领导干部法制观念淡薄，往往以言代法，以权代法，干扰政法部门依法办事。二是有司法部门的两面政治素质比较差，在保护层、关系网面前不能实事求是，铁面无私地依法办案。三是学法

知法懂法的人太少，连一些职务相当高的领导干部也不懂法律。”

“我只想讲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要尊重知识和人才，尤其应尊重本国的知识和本国的人才。”声学专家汪德昭教授的这个建议，引起许多政协委员的共鸣。

汪教授说，一个科学家最感伤心的事，恐怕莫过于他的科研成果和他所培育的人才，被弃置不用了。在声学研究领域，最近一年多的时间内，取得具有先进水平三项科研成果：浅地层剖面仪、鱼探仪和超声诊断仪。去年，有个单位进口的美国仪器探测，发现某河口航道浅滩处有礁石，若将此礁石炸掉，需要花一亿四千万美元，后来我们用研制的浅地层剖面仪探测，结论根本没有那么大的礁石，只需七百万美元就可以解决问题。可是，对自己国家这样先进产品，有些单位却不使用。为什么？汪教授说：某些单位和个人，为了捞到好处，不考虑整个社会效益，盲目引进外国产品。这种作法，不仅压制了民族的科技产品，而且打击了本国的科技人员。还有一个明显的例子。汪教授所属一个学生，叫高尔昌，现任声学研究所所长，是研究员。几年前他在美国一家声学权威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论文《广义射线和简正波互易的关系》，受到国际同行的重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一个高级学术委员会，于去年9月邀请他在意大利举行的学术会议上作特约专题报告，受到国际学者的称赞。在讨论时，他被选为小组的主席。可是这样一篇有国际水平的学术论文，却受到国内学术学术刊物的冷遇，因为在国内发不出去，高尔昌只好送国外发表。提起这件事，汪教授感慨至深。他说，我们不少的人才及其成果，往往在国内不被承认，一旦外国某权威说句话，就立即身价百倍。这种“颠倒”，是到了应该颠倒过来的时候了。

好象是唯恐引起别人误解似的，汪德昭教授补充说：“不是有人会以我对引进国外先进技术才持有异议？不，恰恰相反。我想提醒的是：在积极引进先进技术和科技人才的同时，还要充分利用本国的知识和本国的人才。只看重外国的知识和人才，而忽视本国的知识和人才，或者只相信外国的知识而不相信或不太相信本国的知识，对我国的科技发展是有利的，对调动科技人员的积极性是不利的。”

汪教授说，一个科学家最感伤心的事，恐怕莫过于他的科研成果和他所培育的人才，被弃置不用了。在声学研究领域，最近一年多的时间内，取得具有先进水平三项科研成果：浅地层剖面仪、鱼探仪和超声诊断仪。去年，有个单位进口的美国仪器探测，发现某河口航道浅滩处有礁石，若将此礁石炸掉，需要花一亿四千万美元，后来我们用研制的浅地层剖面仪探测，结论根本没有那么大的礁石，只需七百万美元就可以解决问题。可是，对自己国家这样先进产品，有些单位却不使用。为什么？汪教授说：某些单位和个人，为了捞到好处，不考虑整个社会效益，盲目引进外国产品。这种作法，不仅压制了民族的科技产品，而且打击了本国的科技人员。还有一个明显的例子。汪教授所属一个学生，叫高尔昌，现任声学研究所所长，是研究员。几年前他在美国一家声学权威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论文《广义射线和简正波互易的关系》，受到国际同行的重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一个高级学术委员会，于去年9月邀请他在意大利举行的学术会议上作特约专题报告，受到国际学者的称赞。在讨论时，他被选为小组的主席。可是这样一篇有国际水平的学术论文，却受到国内学术学术刊物的冷遇，因为在国内发不出去，高尔昌只好送国外发表。提起这件事，汪教授感慨至深。他说，我们不少的人才及其成果，往往在国内不被承认，一旦外国某权威说句话，就立即身价百倍。这种“颠倒”，是到了应该颠倒过来的时候了。

汪教授说，一个科学家最感伤心的事，恐怕莫过于他的科研成果和他所培育的人才，被弃置不用了。在声学研究领域，最近一年多的时间内，取得具有先进水平三项科研成果：浅地层剖面仪、鱼探仪和超声诊断仪。去年，有个单位进口的美国仪器探测，发现某河口航道浅滩处有礁石，若将此礁石炸掉，需要花一亿四千万美元，后来我们用研制的浅地层剖面仪探测，结论根本没有那么大的礁石，只需七百万美元就可以解决问题。可是，对自己国家这样先进产品，有些单位却不使用。为什么？汪教授说：某些单位和个人，为了捞到好处，不考虑整个社会效益，盲目引进外国产品。这种作法，不仅压制了民族的科技产品，而且打击了本国的科技人员。还有一个明显的例子。汪教授所属一个学生，叫高尔昌，现任声学研究所所长，是研究员。几年前他在美国一家声学权威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论文《广义射线和简正波互易的关系》，受到国际同行的重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一个高级学术委员会，于去年9月邀请他在意大利举行的学术会议上作特约专题报告，受到国际学者的称赞。在讨论时，他被选为小组的主席。可是这样一篇有国际水平的学术论文，却受到国内学术学术刊物的冷遇，因为在国内发不出去，高尔昌只好送国外发表。提起这件事，汪教授感慨至深。他说，我们不少的人才及其成果，往往在国内不被承认，一旦外国某权威说句话，就立即身价百倍。这种“颠倒”，是到了应该颠倒过来的时候了。

汪教授说，一个科学家最感伤心的事，恐怕莫过于他的科研成果和他所培育的人才，被弃置不用了。在声学研究领域，最近一年多的时间内，取得具有先进水平三项科研成果：浅地层剖面仪、鱼探仪和超声诊断仪。去年，有个单位进口的美国仪器探测，发现某河口航道浅滩处有礁石，若将此礁石炸掉，需要花一亿四千万美元，后来我们用研制的浅地层剖面仪探测，结论根本没有那么大的礁石，只需七百万美元就可以解决问题。可是，对自己国家这样先进产品，有些单位却不使用。为什么？汪教授说：某些单位和个人，为了捞到好处，不考虑整个社会效益，盲目引进外国产品。这种作法，不仅压制了民族的科技产品，而且打击了本国的科技人员。还有一个明显的例子。汪教授所属一个学生，叫高尔昌，现任声学研究所所长，是研究员。几年前他在美国一家声学权威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论文《广义射线和简正波互易的关系》，受到国际同行的重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一个高级学术委员会，于去年9月邀请他在意大利举行的学术会议上作特约专题报告，受到国际学者的称赞。在讨论时，他被选为小组的主席。可是这样一篇有国际水平的学术论文，却受到国内学术学术刊物的冷遇，因为在国内发不出去，高尔昌只好送国外发表。提起这件事，汪教授感慨至深。他说，我们不少的人才及其成果，往往在国内不被承认，一旦外国某权威说句话，就立即身价百倍。这种“颠倒”，是到了应该颠倒过来的时候了。

汪教授说，一个科学家最感伤心的事，恐怕莫过于他的科研成果和他所培育的人才，被弃置不用了。在声学研究领域，最近一年多的时间内，取得具有先进水平三项科研成果：浅地层剖面仪、鱼探仪和超声诊断仪。去年，有个单位进口的美国仪器探测，发现某河口航道浅滩处有礁石，若将此礁石炸掉，需要花一亿四千万美元，后来我们用研制的浅地层剖面仪探测，结论根本没有那么大的礁石，只需七百万美元就可以解决问题。可是，对自己国家这样先进产品，有些单位却不使用。为什么？汪教授说：某些单位和个人，为了捞到好处，不考虑整个社会效益，盲目引进外国产品。这种作法，不仅压制了民族的科技产品，而且打击了本国的科技人员。还有一个明显的例子。汪教授所属一个学生，叫高尔昌，现任声学研究所所长，是研究员。几年前他在美国一家声学权威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论文《广义射线和简正波互易的关系》，受到国际同行的重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一个高级学术委员会，于去年9月邀请他在意大利举行的学术会议上作特约专题报告，受到国际学者的称赞。在讨论时，他被选为小组的主席。可是这样一篇有国际水平的学术论文，却受到国内学术学术刊物的冷遇，因为在国内发不出去，高尔昌只好送国外发表。提起这件事，汪教授感慨至深。他说，我们不少的人才及其成果，往往在国内不被承认，一旦外国某权威说句话，就立即身价百倍。这种“颠倒”，是到了应该颠倒过来的时候了。

汪教授说，一个科学家最感伤心的事，恐怕莫过于他的科研成果和他所培育的人才，被弃置不用了。在声学研究领域，最近一年多的时间内，取得具有先进水平三项科研成果：浅地层剖面仪、鱼探仪和超声诊断仪。去年，有个单位进口的美国仪器探测，发现某河口航道浅滩处有礁石，若将此礁石炸掉，需要花一亿四千万美元，后来我们用研制的浅地层剖面仪探测，结论根本没有那么大的礁石，只需七百万美元就可以解决问题。可是，对自己国家这样先进产品，有些单位却不使用。为什么？汪教授说：某些单位和个人，为了捞到好处，不考虑整个社会效益，盲目引进外国产品。这种作法，不仅压制了民族的科技产品，而且打击了本国的科技人员。还有一个明显的例子。汪教授所属一个学生，叫高尔昌，现任声学研究所所长，是研究员。几年前他在美国一家声学权威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论文《广义射线和简正波互易的关系》，受到国际同行的重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一个高级学术委员会，于去年9月邀请他在意大利举行的学术会议上作特约专题报告，受到国际学者的称赞。在讨论时，他被选为小组的主席。可是这样一篇有国际水平的学术论文，却受到国内学术学术刊物的冷遇，因为在国内发不出去，高尔昌只好送国外发表。提起这件事，汪教授感慨至深。他说，我们不少的人才及其成果，往往在国内不被承认，一旦外国某权威说句话，就立即身价百倍。这种“颠倒”，是到了应该颠倒过来的时候了。

汪教授说，一个科学家最感伤心的事，恐怕莫过于他的科研成果和他所培育的人才，被弃置不用了。在声学研究领域，最近一年多的时间内，取得具有先进水平三项科研成果：浅地层剖面仪、鱼探仪和超声诊断仪。去年，有个单位进口的美国仪器探测，发现某河口航道浅滩处有礁石，若将此礁石炸掉，需要花一亿四千万美元，后来我们用研制的浅地层剖面仪探测，结论根本没有那么大的礁石，只需七百万美元就可以解决问题。可是，对自己国家这样先进产品，有些单位却不使用。为什么？汪教授说：某些单位和个人，为了捞到好处，不考虑整个社会效益，盲目引进外国产品。这种作法，不仅压制了民族的科技产品，而且打击了本国的科技人员。还有一个明显的例子。汪教授所属一个学生，叫高尔昌，现任声学研究所所长，是研究员。几年前他在美国一家声学权威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论文《广义射线和简正波互易的关系》，受到国际同行的重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一个高级学术委员会，于去年9月邀请他在意大利举行的学术会议上作特约专题报告，受到国际学者的称赞。在讨论时，他被选为小组的主席。可是这样一篇有国际水平的学术论文，却受到国内学术学术刊物的冷遇，因为在国内发不出去，高尔昌只好送国外发表。提起这件事，汪教授感慨至深。他说，我们不少的人才及其成果，往往在国内不被承认，一旦外国某权威说句话，就立即身价百倍。这种“颠倒”，是到了应该颠倒过来的时候了。

汪教授说，一个科学家最感伤心的事，恐怕莫过于他的科研成果和他所培育的人才，被弃置不用了。在声学研究领域，最近一年多的时间内，取得具有先进水平三项科研成果：浅地层剖面仪、鱼探仪和超声诊断仪。去年，有个单位进口的美国仪器探测，发现某河口航道浅滩处有礁石，若将此礁石炸掉，需要花一亿四千万美元，后来我们用研制的浅地层剖面仪探测，结论根本没有那么大的礁石，只需七百万美元就可以解决问题。可是，对自己国家这样先进产品，有些单位却不使用。为什么？汪教授说：某些单位和个人，为了捞到好处，不考虑整个社会效益，盲目引进外国产品。这种作法，不仅压制了民族的科技产品，而且打击了本国的科技人员。还有一个明显的例子。汪教授所属一个学生，叫高尔昌，现任声学研究所所长，是研究员。几年前他在美国一家声学权威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论文《广义射线和简正波互易的关系》，受到国际同行的重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一个高级学术委员会，于去年9月邀请他在意大利举行的学术会议上作特约专题报告，受到国际学者的称赞。在讨论时，他被选为小组的主席。可是这样一篇有国际水平的学术论文，却受到国内学术学术刊物的冷遇，因为在国内发不出去，高尔昌只好送国外发表。提起这件事，汪教授感慨至深。他说，我们不少的人才及其成果，往往在国内不被承认，一旦外国某权威说句话，就立即身价百倍。这种“颠倒”，是到了应该颠倒过来的时候了。

汪教授说，一个科学家最感伤心的事，恐怕莫过于他的科研成果和他所培育的人才，被弃置不用了。在声学研究领域，最近一年多的时间内，取得具有先进水平三项科研成果：浅地层剖面仪、鱼探仪和超声诊断仪。去年，有个单位进口的美国仪器探测，发现某河口航道浅滩处有礁石，若将此礁石炸掉，需要花一亿四千万美元，后来我们用研制的浅地层剖面仪探测，结论根本没有那么大的礁石，只需七百万美元就可以解决问题。可是，对自己国家这样先进产品，有些单位却不使用。为什么？汪教授说：某些单位和个人，为了捞到好处，不考虑整个社会效益，盲目引进外国产品。这种作法，不仅压制了民族的科技产品，而且打击了本国的科技人员。还有一个明显的例子。汪教授所属一个学生，叫高尔昌，现任声学研究所所长，是研究员。几年前他在美国一家声学权威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论文《广义射线和简正波互易的关系》，受到国际同行的重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一个高级学术委员会，于去年9月邀请他在意大利举行的学术会议上作特约专题报告，受到国际学者的称赞。在讨论时，他被选为小组的主席。可是这样一篇有国际水平的学术论文，却受到国内学术学术刊物的冷遇，因为在国内发不出去，高尔昌只好送国外发表。提起这件事，汪教授感慨至深。他说，我们不少的人才及其成果，往往在国内不被承认，一旦外国某权威说句话，就立即身价百倍。这种“颠倒”，是到了应该颠倒过来的时候了。

汪教授说，一个科学家最感伤心的事，恐怕莫过于他的科研成果和他所培育的人才，被弃置不用了。在声学研究领域，最近一年多的时间内，取得具有先进水平三项科研成果：浅地层剖面仪、鱼探仪和超声诊断仪。去年，有个单位进口的美国仪器探测，发现某河口航道浅滩处有礁石，若将此礁石炸掉，需要花一亿四千万美元，后来我们用研制的浅地层剖面仪探测，结论根本没有那么大的礁石，只需七百万美元就可以解决问题。可是，对自己国家这样先进产品，有些单位却不使用。为什么？汪教授说：某些单位和个人，为了捞到好处，不考虑整个社会效益，盲目引进外国产品。这种作法，不仅压制了民族的科技产品，而且打击了本国的科技人员。还有一个明显的例子。汪教授所属一个学生，叫高尔昌，现任声学研究所所长，是研究员。几年前他在美国一家声学权威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论文《广义射线和简正波互易的关系》，受到国际同行的重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一个高级学术委员会，于去年9月邀请他在意大利举行的学术会议上作特约专题报告，受到国际学者的称赞。在讨论时，他被选为小组的主席。可是这样一篇有国际水平的学术论文，却受到国内学术学术刊物的冷遇，因为在国内发不出去，高尔昌只好送国外发表。提起这件事，汪教授感慨至深。他说，我们不少的人才及其成果，往往在国内不被承认，一旦外国某权威说句话，就立即身价百倍。这种“颠倒”，是到了应该颠倒过来的时候了。

汪教授说，一个科学家最感伤心的事，恐怕莫过于他的科研成果和他所培育的人才，被弃置不用了。在声学研究领域，最近一年多的时间内，取得具有先进水平三项科研成果：浅地层剖面仪、鱼探仪和超声诊断仪。去年，有个单位进口的美国仪器探测，发现某河口航道浅滩处有礁石，若将此礁石炸掉，需要花一亿四千万美元，后来我们用研制的浅地层剖面仪探测，结论根本没有那么大的礁石，只需七百万美元就可以解决问题。可是，对自己国家这样先进产品，有些单位却不使用。为什么？汪教授说：某些单位和个人，为了捞到好处，不考虑整个社会效益，盲目引进外国产品。这种作法，不仅压制了民族的科技产品，而且打击了本国的科技人员。还有一个明显的例子。汪教授所属一个学生，叫高尔昌，现任声学研究所所长，是研究员。几年前他在美国一家声学权威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论文《广义射线和简正波互易的关系》，受到国际同行的重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一个高级学术委员会，于去年9月邀请他在意大利举行的学术会议上作特约专题报告，受到国际学者的称赞。在讨论时，他被选为小组的主席。可是这样一篇有国际水平的学术论文，却受到国内学术学术刊物的冷遇，因为在国内发不出去，高尔昌只好送国外发表。提起这件事，汪教授感慨至深。他说，我们不少的人才及其成果，往往在国内不被承认，一旦外国某权威说句话，就立即身价百倍。这种“颠倒”，是到了应该颠倒过来的时候了。

汪教授说，一个科学家最感伤心的事，恐怕莫过于他的科研成果和他所培育的人才，被弃置不用了。在声学研究领域，最近一年多的时间内，取得具有先进水平三项科研成果：浅地层剖面仪、鱼探仪和超声诊断仪。去年，有个单位进口的美国仪器探测，发现某河口航道浅滩处有礁石，若将此礁石炸掉，需要花一亿四千万美元，后来我们用研制的浅地层剖面仪探测，结论根本没有那么大的礁石，只需七百万美元就可以解决问题。可是，对自己国家这样先进产品，有些单位却不使用。为什么？汪教授说：某些单位和个人，为了捞到好处，不考虑整个社会效益，盲目引进外国产品。这种作法，不仅压制了民族的科技产品，而且打击了本国的科技人员。还有一个明显的例子。汪教授所属一个学生，叫高尔昌，现任声学研究所所长，是研究员。几年前他在美国一家声学权威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论文《广义射线和简正波互易的关系》，受到国际同行的重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一个高级学术委员会，于去年9月邀请他在意大利举行的学术会议上作特约专题报告，受到国际学者的称赞。在讨论时，他被选为小组的主席。可是这样一篇有国际水平的学术论文，却受到国内学术学术刊物的冷遇，因为在国内发不出去，高尔昌只好送国外发表。提起这件事，汪教授感慨至深。他说，我们不少的人才及其成果，往往在国内不被承认，一旦外国某权威说句话，就立即身价百倍。这种“颠倒”，是到了应该颠倒过来的时候了。

尤其应尊重本国的知识和人才

政协常委、著名声学家汪德昭教授

本报记者 王学季



搞好教育改革 培养一代新人

民盟和九三学社成员分别讨论教育体制改革问题

新华社北京4月7日电 民盟中央常务委员会今天上午举行扩大会议，讨论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问题。参加会议的四十四位同志都是正在出席六届人大三次会议和全国政协六届三次会议的代表和委员。

民盟中央副主席董崇武主持会议并讲了话。副主席彭迪先、萨空了、李文范、费孝通、闻家驊、钱伟长、高天、叶笃义、陶大镛参加了座谈会。

董崇武在讲话中说，民盟大多数同志在教育战线工作。几年来，许多同志通过各种方式对教育改革提出了很多富有建设性的意见。他说，搞好教育体制改革是一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民盟在这方面作出贡献义不容辞。

王起、陈新民、罗雄才，

王金陵、赵少辛、吴富恒、金德如、陆宗达等在座谈会上发言。他们就实行义务教育、办好中小学教育、招生工作、学生毕业后的分配、人才的培养与使用以及教师的地位和待遇等问题提出了许多建议。

本报讯 通讯员陆晏报道：4月7日上午，参加六届人大三次会议的代表和政协六届三次会议的委员中的九三学社成员，在国谊宾馆集会，热烈讨论了教育体制改革问题。

参加会议的同志普遍认为，我国的教育事业有了很大发展，但是和当前经济形势的发展还不相适应。他们说，教育体制改革中应放权、调整比例、改革教学和管理制度等问题，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其中特别提到我国对职业教育重视不够，比例失调等问题，讨

论中谈到，许多发达国家对普及教育、职业教育很重视，我们在这方面做得差，在社会上存在“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风气。这个情况从现在开始就要引起重视。

许多同志提出，要重视教育新质量，一是要提高教师业务水平。

王金陵、赵少辛、吴富恒、金德如、陆宗达等在座谈会上发言。他们就实行义务教育、办好中小学教育、招生工作、学生毕业后的分配、人才的培养与使用以及教师的地位和待遇等问题提出了许多建议。

王金陵、赵少辛、吴富恒、金德如、陆宗达等在座谈会上发言。他们就实行义务教育、办好中小学教育、招生工作、学生毕业后的分配、人才的培养与使用以及教师的地位和待遇等问题提出了许多建议。

王金陵、赵少辛、吴富恒、金德如、陆宗达等在座谈会上发言。他们就实行义务教育、办好中小学教育、招生工作、学生毕业后的分配、人才的培养与使用以及教师的地位和待遇等问题提出了许多建议。

王金陵、赵少辛、吴富恒、金德如、陆宗达等在座谈会上发言。他们就实行义务教育、办好中小学教育、招生工作、学生毕业后的分配、人才的培养与使用以及教师的地位和待遇等问题提出了许多建议。

王金陵、赵少辛、吴富恒、金德如、陆宗达等在座谈会上发言。他们就实行义务教育、办好中小学教育、招生工作、学生毕业后的分配、人才的培养与使用以及教师的地位和待遇等问题提出了许多建议。

王金陵、赵少辛、吴富恒、金德如、陆宗达等在座谈会上发言。他们就实行义务教育、办好中小学教育、招生工作、学生毕业后的分配、人才的培养与使用以及教师的地位和待遇等问题提出了许多建议。

王金陵、赵少辛、吴富恒、金德如、陆宗达等在座谈会上发言。他们就实行义务教育、办好中小学教育、招生工作、学生毕业后的分配、人才的培养与使用以及教师的地位和待遇等问题提出了许多建议。

王金陵、赵少辛、吴富恒、金德如、陆宗达等在座谈会上发言。他们就实行义务教育、办好中小学教育、招生工作、学生毕业后的分配、人才的培养与使用以及教师的地位和待遇等问题提出了许多建议。

王金陵、赵少辛、吴富恒、金德如、陆宗达等在座谈会上发言。他们就实行义务教育、办好中小学教育、招生工作、学生毕业后的分配、人才的培养与使用以及教师的地位和待遇等问题提出了许多建议。

王金陵、赵少辛、吴富恒、金德如、陆宗达等在座谈会上发言。他们就实行义务教育、办好中小学教育、招生工作、学生毕业后的分配、人才的培养与使用以及教师的地位和待遇等问题提出了许多建议。

中国革命转定乾坤的历史大决战——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已经胜利三十多年了。在那烽火年代里，贺龙同志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直接领导下，历任晋绥军区、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和西北军区的司令员，并相继兼任中共西北局常委、第二书记和西北财经委员会主任等职。他胸怀战略全局，勇挑革命重担，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立下了卓越的功勋。

虎略龙韬战顽敌

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贺龙同志作为西北我军的主要统帅之一，先后率我军民同国民党军作战，以其卓越的军事才能和高超的指挥艺术，导演了许多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战斗。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后，为了保卫人民的胜利果实，贺龙同志遵照中央军委的统一部署，率领晋绥野战军从陕甘宁边区昼夜兼程赶至晋中前线，执行限期解除日伪武装、绥靖和扩大解放区的任务。在他和李泉泉同志的统一指挥下，晋绥军民英勇反攻作战仅二十天，就收复县城九座，攻克据点近百，并一度攻入归绥，威逼太原、大同，切断了同蒲、平绥路，使大片国土光复，人民重见天日。9月间，党中央为控制热、察，发展东北，提出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晋中反攻作战胜利后，贺龙同志迅速挥师北上，迅速侵犯绥远、察西根据地的国民党绥远部队。贺龙同志并且根据晋绥地区的敌我态势，及时提出了“集中主力打击北线绥远之敌，南线对阎锡山军暂取守势，以控制雁北及绥远大部，保卫热察根据地侧翼安全”的作战方针。这一作战方针，得到了中央军委的完全赞同。自10月起，由聂荣臻同志贺龙同志共同指挥晋绥、晋察冀军发起了绥远战役。是役打响后，经过战略陈兵的晋绥野战军攻势凌厉，连克凉城、天城、新赛等地。这时，遭到敌人痛击的绥远之敌突然纷纷龟缩，伺机西逃归队，贺龙同志毅然改变东向集宁、丰镇和晋察冀部队会师、歼敌于绥远一带的预定作战计划，当即命令部队挥戈北进，截敌归队，直插平绥线上重镇察南。经一昼夜激战，全歼守敌蒋介石之嫡系二十六师，夺取了绥远战役开始后的第一个重大胜利。这一仗是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初期一次较大规模的歼灭战，充分显示了贺龙同志卓越的军事才能。到12月中旬为止，我军在绥远战役中共歼敌一万二千多人，收复了绥远、绥南广大地区，从而摧毁了敌人的东进计划，减轻了敌人对我华北战略要地张家口威胁。

1946年6月全面内战爆发，向我晋绥解放区发起进攻的敌人达二十多个旅万人。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贺龙同志采取“远交近攻”的策略，指挥晋绥野战军和晋察冀军区一部发起晋北战役，对盘据在同蒲路北段的阎锡山军队展开大张挞伐，激战四十余天，连克县城八座，歼敌八千余人。这一战役的胜利，解放了同蒲路的忻县以东以北大同以南广大地区，切断了太原、大同敌人之间的联系，使我晋察冀、晋绥两广大解放区连成了一片。同年底，为策应陕甘宁边区部队保卫延安，贺龙同志又调派晋绥部队协同我我军先后发起了晋南和汾孝两战役，激战两个月，歼敌三万，使晋西北北起中阳，南至吉县，西迄黄河，东抵同蒲间广大地区尽获解放，胜利地完成了中央军委赋予的“坚持与发展吕梁区”的任务，粉碎了胡宗南军由晋西南偷渡黄河侵袭陕甘宁边区的阴谋。在贺龙同志的领导和指挥下，晋绥军民在人民解放战争初期所取得的这些胜利，不仅解除了国民党军对我陕甘宁边区东境的威胁，也为尔后我军在西北地区作战提供了可靠的后方，保证了党中央联系全国各解放区的需要。

1947年，蒋介石对陕甘宁边区实施重点进攻后，中央军委决定贺龙同志重新出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以加强西北

转战晋绥、解放西北建伟功

——贺龙同志在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王震 余秋里 黄新廷 王尚荣

地区的军事建设。此后，在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他积极参与制定了我军进入西北战场上我军一些重大的战略战役决策。早在敌人重点进攻前夕，他就和彭德怀、习仲勋、王等同志在山西离石进行会商，就陕甘宁、晋绥两区的联防作战作出了统一部署；1947年7月他出席中共中央小河会议，在毛泽东同志主持下参加了对全国战略大反攻的筹划；在同年12月召开的西野前委扩大会议期间，他又和彭德怀等同志确定了西野南下反攻的外线作战计划；西北我军的另外一些重大战役行动，也往往都是由彭德怀同志事先征求他的意见或者共同商定实施的。贺龙同志还积极协同彭德怀同志领导西北野战军加强部队建设。他曾多次出席西野前委和一些部队的党委会，传达中央的方针战策，领导总结作战经验，介绍后方建设形势，对某些团练敌寇、违反政策纪律的现象提出严肃批评，促进了部队的团结一致，激发了指战员的革命斗志。与此同时，在贺龙同志的直接指挥下，联防军区所属的地方武装也在战火硝烟中迅速壮大，仅在1947、1948两年间就对敌作战四千八百多次，歼敌六万三千多人，从而圆满地完成了党中央赋予贺龙同志北面对付傅作义，东制阎锡山，西打击孙占宁三马，配合西野主力粉碎胡宗南进攻的战略重任，大大加速了西北解放战争的胜利进程，也有力地支援了华北我军的对敌斗争。

呕心沥血建后方

1947年7月陕北战事爆发后，“胡胡”天灾给边区人民带来了巨大灾难。敌人疯狂进攻所到之处，烧杀淫掠，十室九空，严重的自然灾害，使许多地方土地荒芜，颗粒不收。晋绥解放区在经过八年抗战和一年的自卫战争以后，1947年的晋绥动员率最高已达14%，人力、物力、财力都已接近枯竭的边缘。西北解放战争面临着巨大的困难。在这样一个严峻的危难时刻，贺龙同志奉党中央之命出任西北财经委员会主任，把自己所领导的主力部队调归西北野战军受彭德怀同志指挥，毅然担负起了为转战陕北的党中央和西北野战军建设后方，支援前线的光荣重任。在此之前，他就将大批武器弹药运过黄河以西，支援了我军保卫延安、三战三捷等战斗。8月间，根据中央小河会议的决定，他在绥远召开的一次干部会议上提出了统一陕甘宁、晋绥两区财政经济、加强后方支前的任务。会后，他和林伯渠、习仲勋等同志通过采取统一金融贸易、整顿税收、实行统筹支等措施，迅速实现了陕甘宁、晋绥两区财政经济的统一，为支援战争奠定了基础。在组织体制方面，也逐步建立健全了领导前方支前的若干机构，成立了边区支前司令部；明确联防军区后勤部为两区部队后勤工作的指挥所，任命陕甘宁边区政府后勤部为两区部队兼主任部长，紧密配合刘景范同志任司令员的西野后勤工作，大大加强了地方政府对后方支前和军队后勤工作的统一筹划、领导。组织了西北财委运输大队，以集中人力、畜力，加强支前的运输力量。为了节省民力、减少浪费，贺龙还和林伯渠、习仲勋、李井泉、武新宇等同志一起先后制定了《陕甘宁边区战时勤务动员员暂行办法》、《晋绥边区战时军用勤务员办法》、《严禁滥发动员员勤务令》等文件，颁布全

体军民照准执行。在贺龙同志的统一筹划下，原陕甘宁边区的工厂也移植黄河以东，和晋绥军区的工匠、军需工丁一起夜以继日地生产被服、弹药，以供应前方急需。西北地区通货膨胀，战争紧张的1947、1948年，又遭受严重干旱，全体军民吃饭遇到很大困难。为了缺粮，一些战役计划被迫取消，群众生活极端困苦。为了筹粮救灾，救灾救人，贺龙同志不辞辛劳，全力以赴，奔走于黄河两岸，秦晋高原。他和两区党政领导发出了“一切为了战争胜利”的号召，组织后方军民采取自救互济，运粮接济，移地就食，加紧生产等办法，全力为战胜“胡胡”天灾而斗争。西北野战军第二次攻打榆林时，他亲自从动员员粮食。运输工具不足，就发动群众用布包、人背，三十斤一包，三十里一站，硬是把数千石粮食运到黄河渡口，保障了大战的需要。1948年初，他直接主持了晋察冀豫解放区支援的六万大石粮食的运输，亲自负责这次运粮的陕甘宁边区粮管处长薛兰斌交代了任务，并从延安大学调了一千多名教职员工作为运粮骨干。吕梁地区的十多户民户不顾军阀和敌机的轰炸，在长达千里的运输线上昼夜赶运。贺龙同志亲临临县、离石一带进行检查，选择粮运线路，常常在朔风刺骨的寒夜山上背上粮运队伍。在他的带动下，沿途许多领导干部都背粮上路，终于将这批粮食及时运过黄河，解决了救灾和战争的急需。在集中物力、财力支援前线的时候，贺龙同志和西北党政领导还不断发动群众参军参战，仅在1947、1948两年就组建了九个旅送到前线，不仅充实壮大了西北野战军，也为华北战场输送了大批兵员。在贺龙同志的领导下，西北战场的后勤工作很快转变了不适应战争初期的状态，做到了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大批粮食、弹药、武器、医药、被服等物资源源不断地送到前线，保证了西北我军各次重大战役的胜利。

为了更有力地支援西北解放战争，贺龙同志还积极参与了对陕甘宁、晋绥两解放区根据地建设的领导。1946年春在党中央“五四指示”发出后，为了适应新的形势，完成土改这一党在当时的最本任务，他和李井泉等同志主持召开了晋绥分局高干会议，并在该次会议上所作的讲话中明确指出：土改是党在当前一切工作中的中心环节，是战胜敌人的基本条件，只要土地问题解决了，群众的斗争积极性就会起来，蒋介石打我们五年、十年、一百年也不怕。在对照“五四指示”检查工作的基础上，高干会讨论如何发动群众解决土地问题作出了具体部署，并明确提出要坚决禁止侵犯中农利益、禁止乱打乱杀、培训干部、转变领导思想作风等正确方针，向晋绥人民发出了全面开展土地改革的动员令。会后，贺龙同志向李维汉、刘少奇同志作出了全面汇报，并和李井泉、张稼夫等同志派出工作组深入农村进行调查，根据晋绥地区占有情况提出要分类指导、区别对待；制定出一个后来被毛泽东同志称为马列主义文件的《怎样划分农村阶级成份》的小册子，作为土改工作的依据；开办党校训练班，培养大批土改工作骨干。为了支持地方的土改运动，贺龙还和李井泉同志向晋绥部队发出了《支持地方三大任务、帮助群众工作发动群众解决土地问题的指示》，召开了以贯彻土改思想为中心内容的晋绥军区建军会议。由于这一系列

认真细致的准备工作，土改运动很快就在晋绥解放区轰轰烈烈地开展了起来。1947年11月，为了贯彻全国土地会议决议，贺龙同志又和习仲勋等同志主持召开又义干部会议，推动了土改、整党工作在陕甘宁边区的迅速开展，在翻天覆地的群众运动发展过程中，陕甘宁和晋绥地区都曾一度出现一些“左”倾偏向，虽然这些偏向主要是由于康生、陈伯达的干扰、影响所造成的，但是，贺龙同志对此却从不争功诿过，他曾经多次以主要领导者之一的身份向党中央和干部作出自我批评，并领导坚决纠正，指出“纠‘左’不彻底的地方，那怕是一分也要纠正过来”。充分显示了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心底无私、胸怀坦荡的高风亮节。党的12月会议后，他亲自深入晋西南检查土改、整党工作，传达中央和西北局的正确政策方针，制止了一些“左”的做法。1948年冬，他又和习仲勋等同志召集地区联席会议，规定了在整顿与发展组织的前提下加强教育，提高党员思想和支部工作效能的正确整党方针。由于采取了这些措施，“左”倾偏向一经发现即被纠正，使整个土改整党工作重新走上了健康发展的正轨，从而更加焕发了人民群众为保卫胜利果实而努力生产、参军参战的积极性。晋绥区在1948年土改、整党后掀起的参军高潮中，党员干部积极带头，一个月就有六千多名翻身农民报名入伍。陕甘宁边区群众在粮食被敌人抢光的情况下，抢救高梁、玉米烘干后送到前线，保证了战争的急需。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由贺龙等同志领导的陕甘宁、晋绥两解放区的土改、整党运动，为促进根据地的巩固与发展，战胜蒋胡军队创造了根本条件，在人民解放战争史上写下了光荣的一页。

在领导后方建设中，贺龙同志尤为注意发展根据地的经济建设和文化教育事业。他曾被批判说主持召开生产、财经会议，提出减轻群众负担，以利休养生息，促进生产发展的方针；批评过脱离群众的片面财政观点，提出要依靠发展生产解决财政困难，保障供给，稳定金融，使根据地的农业、工业、家庭副业都得到全面发展。他还经常出席文艺工作座谈会，勉励文艺工作者要组织起来，充分发挥笔杆子的作用，在实现党的总任务中赶上军事形势的胜利发展。1945年文作会的文作时，他亲自领导建立了联防军驻晋绥晋学社并兼任校长。在解放战争的烽火硝烟中，这所学校辗转转晋大漠、渭水之滨，逐渐发展成为后来的西北军政大学，培养了成千上万的进步知识青年，为当时的革命战争培养了大批干部。

1949年5月西安解放后，贺龙同志又奉党中央之命出任西安军管会主任。在和贺哲苏等同志的领导下，军管会迅速完成了接管任务，并且在恢复生产，肃清特务土匪，稳定社会治安，统一贸易金融方面也都取得了很大成效，使古都西安面貌焕然一新，成为我军解放大西北的重要后方基地。同年底，贺龙同志率领十八兵团跨越重峦叠嶂的秦岭山岭，踏上进军大西北的征程，由此结束了他在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为解放祖国大西北而作出的岁月。对贺龙同志在西北解放战争期间建设后方，领导支前中作出的巨大贡献，毛泽东同志曾把他和彭德怀两同志比喻为萧何与韩信，是党中央转战陕北期间的左臂右膀，是指挥我军不断夺取西北大捷的两员战将。

贺龙同志是我党杰出的军事家、革命家。但由于贺龙同志生前一向不主张宣传自己和其它种种原因，他在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许多重大历史活动至今鲜为人知。今天我们怀着无限敬重，写文章纪念这位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愿他这种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而不计名利得失、勇挑革命重担的崇高精神，永远激励着千千万万的后来人为了实现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拼搏不已，高歌猛进。

刘澜波同志离开我们已经三年多了，他那亲切的音容笑貌仍深深地留在我脑海里。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1953年，当时他作为中捷友好协会的会长去捷克访问，途经莫斯科。他带来了我姨母赵兰同志的书信，他们都在燃料工业部工作。澜波同志和我年龄相差三十多岁的两代人，我视他为长辈，他对我则象亲切的兄长和朋友。多年来的上下级关系，融洽无间，每次谈话他都能给我以启发，有时也给我一些批评，及时指出我的毛病，而更多的是鼓励和支持。

我和林汉雄、贺敬、崔哲同同志，1954年在莫斯科动力学院毕业。这时正好澜波同志率领中国电力代表团访问苏联。他让我们跟随代表团，一面参加考察，一面做翻译工作。在这次长达四个月的期间，我和澜波同志接触的机会很多，他对我也有了更多的了解。在回国的途中，电力部的同志同他谈到了我们四位毕业生回国后的工作，有人问他是，是不是准备让李鹏当我们的秘书？澜波同志说，我考虑过这个问题，但是我觉他还是应该到基层去锻炼更好一些。我回国不久，组织上就分配我到东北小丰满水电厂工作，这是当时全国最大的水电厂。我在电力部工作了三十年，大部分在基层，做过技术工作、行政工作，也做过党的工作。澜波同志特别要我学会当党委书记，学会做群众工作。在这些工作岗位上，我受到了比较全面的锻炼。

澜波同志的工作作风和工作态度是非常感人的。他对我认真负责，一丝不苟。记得1957年松花江发了大水，严重影响哈尔滨的安全。虽然丰满水库当时对调节洪水还是起了一定的作用，但由于我们经验不足，水库调度工作中有不少缺点，省市的领导同志很有意见。为了向中央和省市的领导说明情况，他除了亲自召开座谈会，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外，还亲自动手起草报告，不要秘书代笔。我为给他提供素材，陪他通宵达旦

一位有远见卓识的人

——怀念刘澜波同志

李鹏

直到写完了报告。我很愿意向他反映基层的真实情况，直率地向他提出我的意见。记得在1958年大跃进时期，我对“大炼钢铁”，搞“超声波”这些做法想不通，又不敢对别人讲。有一次，我对他说：光靠敲小锣一句话怎么能搞成社会主义？我向他反映了丰满发电厂为了大炼钢铁把发电设备都拆下来去搞小高炉，这对电厂的安全生产构成了威胁。他听了我的话后，长时间沉默不语。我体会到他也是有同感的。

与干部密切联系是他的一条重要的工作方法。在每次全国电力工业会议上，他都要找各地来的干部谈话，有时三三两两，有时个别交谈，从工作到家有无话不谈，常常是谈到东方天晓。干部们总是能从他谈话里得到党的温暖，受到启发。

澜波同志既讲原则又通人情，是一个非常厚道的人。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他从来不整人，不赶浪头，也不人云亦云。他善于独立思考，在运动中总是尽可能保护干部。他自已说了错话，引为戒，记得他给我讲过这样一件事，他刚从国民党统治区到延安后不久，毛主席就接见了他们，听取他关于东北军和东北救亡总会的工作汇报。毛主席询问东北抗日联军的情况，他因听过一位抗联的领导同志说过，东北有十万义勇军，一连以意重大的打击，他 also 对此对毛主席说了。毛主席听了他的话后半天不语，只说了一句：十万人那还不把天戳个窟窿？这才使他猛然醒悟，深感后悔，

一位有远见卓识的人

——怀念刘澜波同志

李鹏

因他对这个情况没有做深入的分析，就向毛主席做了不确切的情况汇报。这件事对他的教育十分深刻，他曾多次对人谈过。他因此以这件事现身说法，对我进行教育。在“大跃进”过程中，电力战线虽然也搞过一些诸如“超出力”、“简易发电”的“左”的东西，但是由于他的及时纠正，电力生产还是比较快的得到了恢复，损失是较少的。他的实事求是精神，在电力系统广大干部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澜波同志一生几经坎坷。他长期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曾三次被关入狱，在敌人面前坚贞不屈，表现了中国共产党员高尚的品格。在西安事变前后，他是东北军党的工作委员会的书记，在周恩来同志、叶剑英同志的领导下，做了大量工作，团结了许多东北小军的爱国将领，做了东北军共抗日，为顺利解决西安事变，立下了卓越的功勋。但是他在党内先后两次因此遭受不白之冤。在延安整风时期，他曾受过审查，有人怀疑东北军的地下党不是我们的党，他本人也被诬陷为特务。整风后期，周恩来同志在杨家岭召开了一部分在东北军做党的工作的负责同志，代表党中央宣布：“经过整风，证明东北军的党是我们的党，而且是有成绩的党”，为他们恢复了名誉，重新受到了重用。当他们对说起这些往事的时候，总是付之一笑。但是，他对于康生等人搞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那一套搞“左”的做法，是十分反感的。在十年动乱期间，他受到的折磨就更残酷了。“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他被称为“大叛徒”揪了出来，开始是在北京，后来被送到山西幽

州监狱，整整度过了漫长的十个春秋。但是，他却以惊人的毅力挺过来了。1975年，周总理病重，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澜波同志由于健康情况恶化，被批准回北京，住在北京阜外医院。不久就宣布解除了澜波同志。当杨达同志向我们传达了这个消息后，我和朱琳同志赶到北京医院。相见时，我们又是高兴，又是难受，大家都忍不住泪盈眶。但好景不长，1975年底，政治风云又发生了变化，澜波同志再一次被发配到山西。1977年冬，他的心脏病复发，还开刀了肺炎，经叶帅批准，他才回到北京，又住进阜外医院。1978年组织上对澜波同志的历史问题作出了正确结论，多年的冤案得到昭雪，“大叛徒”的帽子也摘掉了，党得到了恢复。1979年，重新出任电力工业部部长，他又以拚命的精神，为党工作了三年多。

澜波同志对新中国电力工业的创建有很大功绩。几十年来，他为了电力工业的发展，付出了全部心血。特别是1979年恢复工作以后，他深感电力工业的发展适应不了四化建设的要求，作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在同年5月14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了《电力工业必须变革为先行的》文章，提出了改变电力工业落后局面的七条方针。陈云同志认为这是一篇好文章，表示完全支持，并批转给文章的工作方针。他重新出任电力部长后，在拨乱反正工作中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他在工作中的重要贡献可以说出很多，但是，我认为澜波同志最大的贡献，还是他为电力战线培养了一大批干部，包括领导干部、管理干部和技术干部。他在这方面表现了远见卓识。在他的倡导下，早在五十年代初期，就建立了全国电力干部学校。当时大批干部和地方转业业的干部，都要先进这个干部学校，学习文化，学习电力工作知识，两年到三年，然后才分配工作。他十分重视对知识分子的培养和利用。在我国，电力系统是最早建立总工程师制度的。为了使总工程师有职有权，他还主张让他们兼任行政副职，当设计院的副院长、电厂的副厂长或电管局的副局长。1979年以后，针对“四人帮”对干部队伍的严重破坏情况，他考虑最多、抓得最紧的，就是领导班子的整顿、中青年干部的培养和选拔以及队伍作风的建设。1980年全国电力工作会议上，他专门作了调整领导班子的报告，明确地提出了选拔各级领导干部的要求和措施。这个报告受到胡耀邦同志的称赞。1981年他又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带头退出第一线，被邓小平同志誉为“党内开明人士”。

澜波同志过早地离开了我们。十年动乱严重地损害了他的身心健康。他在青年的时候身体是一分强壮的，曾经是一名足球运动员。但到晚年，过早衰老，步履蹒跚，但他还是一直在忘我地工作。他住在北京阜外医院，他的病房成了办公室，每天都要接待好几起来访的客人，日程总是排得满满的；医院对他的警告，甚至抗议，都起不了作用，对他都不能发生效力。他总是说：“我的时间不长了，我要争取为党多做一点工作。”1981年国庆节后，他的病情稍有好转，医院检查同意他出院。就在此时，他做为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常务委员，出席了当年的中纪委全体会议，听报告，看文件，参加讨论，昼夜操劳。会议还没有结束，他的心脏病又复发了，被送回了医院。从此一病不起，直至逝世。澜波同志崇高的共产党人的品格，坚强的党性，鞠躬尽瘁的革命精神是值得我永远怀念和学习的。

会议日期: 四月十三日—四月十五日

报到日期: 四月十二日全天有车接送

中国叉车公司一九八五年订货会

我公司为满足市场需要，特提供CPG0.5、CPG0.8、CPQ1、CPY1、CP0.5、CPQ1.5、CP02、CPQ2、CP03、CPQ3、CCC-3.5CQ-NA、CPGD5、5CB-II、CPGD8等多种吨位叉车的部分货源，欢迎光临。

会议地址: 湖南省衡阳市第二招待所

公司地址: 江苏省镇江市解放路22号

电话: 24908
电报: 5478

